

·中共党史学习补充资料·

事件·人物·名词解释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刊授党校

说 明

这份《事件·人物·名词解释》是为了配合刊授党校学习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的《中共党史教学提纲》，作为补充资料而编写的。因此，凡是《提纲》中已经写得较多较详细的重要会议、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避免重复，本资料中均未选入。所选事件、名词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

因为需用很急，时间仓促，我们水平有限，因此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资料的选编者：党的创立、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何仲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惠香香；建国后的十七年，何仲山、惠香香；“文化大革命”和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金春明。全书由金春明统改。

编 者

1983年5月

目 录

民主革命时期

北洋军阀.....	1	平型关战斗.....	25
巴黎和会.....	1	南京大屠杀.....	26
第三国际.....	2	台儿庄战役.....	26
香港海员大罢工.....	2	百团大战.....	26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	陕甘宁边区.....	27
黄埔军校.....	4	精兵简政.....	27
西山会议派.....	4	减租减息.....	27
戴季陶主义.....	5	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	28
第一次东征.....	5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29
第二次东征.....	6	延安整风运动.....	29
省港大罢工.....	6	远东慕尼黑.....	30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	7	曲线救国.....	3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7	四大家族.....	3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8	民主同盟.....	31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8	苏德战争.....	33
南昌起义.....	9	太平洋战争.....	34
“八·七”会议.....	10	豫湘桂战役.....	34
秋收起义.....	10	重庆谈判.....	35
广州起义.....	11	政治协商会议.....	36
井冈山《土地法》.....	12	国共停战协定.....	37
兴国《土地法》.....	12	“四·八”烈士.....	38
陂头会议.....	12	建立东北根据地.....	39
蒋冯阎中原大战.....	13	“五·四”指示.....	39
六届四中全会.....	13	全国土地会议.....	40
“九·一八”事变.....	14	整党整军运动.....	4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	14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41
宁都起义.....	14	千里跃进大别山.....	41
“一·二八”上海抗战.....	15	辽沈战役.....	42
福建事变.....	15	淮海战役.....	42
查田运动.....	16	平津战役.....	43
陕北革命根据地.....	17	百万雄师过大江.....	43
长征.....	17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44
遵义会议.....	18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44
“一二·九”运动.....	19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45
“七君子”事件.....	19	民主建国会.....	45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0	农工民主党.....	45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21	民主促进会.....	46
芦沟桥事变.....	21	九三学社.....	46
“八·一三”事变.....	22	致公党.....	47
八路军.....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47
新四军.....	23	孙中山.....	43
东北抗日联军.....	24	李大钊.....	49
琼崖纵队.....	24	陈独秀.....	49
东江纵队.....	25	宋庆龄.....	50

廖仲恺	50
邓演达	51
李公朴	51
闻一多	5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52

王明	53
张国焘	53
阎锡山	54
汪精卫	55
胡宗南	55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土地改革运动	57
抗美援朝运动	58
镇压反革命运动	58
“三反五反”运动	59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60
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	61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61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62
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63
对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	64
胡风事件	65
1956年的反冒进	6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66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67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68
党的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	69
莫斯科会议	69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70
南宁会议	71
成都会议	71
“大跃进”运动	71
人民公社化运动	72
我军炮击金门	73
两次郑州会议	74
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	75
1959年庐山会议	76
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	77
布加勒斯特会议	77
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	78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	78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79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79
七千人大会	80
1962年广州会议	82
西楼会议	82
《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83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83
新疆伊犁事件	84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85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85
1963年夏中苏两党会谈	86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	86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过火批判	87
“白银厂事件”	88
“小站经验”	88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89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	89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	90
林彪与江青合谋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	91
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	92
“二月兵变”真相	92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93
“五七指示”	94
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和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	94
红卫兵和大串联	95
关于《公安六条》	96
上海“一月风暴”	96
“三支两军”	97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真相	98
所谓“伍豪事件”	98
武汉“七·二〇”事件	99
“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和全面内战	100
“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101
关于“五十字建党大纲”	101
“杨、余、傅事件”	102
关于刘少奇冤案	102
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103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104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	105
中日邦交正常化	106
评《水浒》运动	106
所谓“三株大毒草”	107
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108
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08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109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109

民主革命时期

北洋军阀

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由北洋大臣统辖。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新军”由几千人扩充到六镇（一镇约一万三千人，相当于师）约七、八万人，改称北洋军。从此，形成了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以封建势力为基础，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凭借军事实力，割据地盘，独霸一方。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窃据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大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三个派系：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由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北京政权也随之不断更易。北洋军阀的混战，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打败掌握北京政权的皖系。第二次是1922年4月爆发的直奉战争，奉系败退山海关外。第三次是1924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奉系控制了北方各省。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兵力二十万，盘踞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河北的一部分。直系军阀另一头子孙传芳有兵力二十万，盘踞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兵力三十五万，盘踞东北各省、京津地带及津浦路北段。

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对内压迫中国人民，镇压革命，争权夺利，长期混战，把中国人民驱向水深火热的绝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但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又被蒋介石窃取，在南京建立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1928年，蒋介石决定再度北伐，展开对奉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同年6月，张作霖败退回东北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张学良改变了屈从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独立”的意图，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亡。

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二十七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和会”名义上是为了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和平，防止新的战争。实际上，在英、法、美三国的操纵下，“和会”成了各帝国主义进行分赃，企图建立战后帝国主义新秩序，阴谋武装干涉苏维埃俄

国，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派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中国人民督促下向大会提出：取消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请求归还日本在大战中所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要求。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人民的这些正义要求，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当时中国北洋军阀对此表示妥协。消息传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因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中国代表团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建立过三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领导创建的国际工人协会，后被称为第一国际。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支持本国的反动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宣告破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许多国家共产党相继建立，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19年3月2日，在列宁领导下，三十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运动纲领》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是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各国支部必须执行它的决议和指示。第三国际成立后共开过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参加了前四次大会。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领导下进行工作。共产国际捍卫了马列主义，帮助各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支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反对国际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党，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也发生过重大偏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由一个国际中心领导各国的革命运动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使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下建立的。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和决议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有许多指示是错误的，对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负有重要责任。

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反对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我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罢工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主要负责人是苏兆征、林伟民等。大罢工的直接起因是物价飞涨，海员

工资微薄，无法维持生活，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经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同资方再三交涉，均被无理拒绝，工人忍无可忍，便举行了大罢工。罢工从1月13日开始。起初只有一千五百人参加，一周之内增加到六千余人。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盟罢工，罢工规模扩大到三万多人。港英当局极为恐慌，下令以武力封闭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抢走海员工会的牌子，逮捕工人多名。香港全市工人群情激愤，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增至十余万，约有几万海员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当全市总罢工时，为阻挠工人返回广州，港英当局又制造了“沙田惨案”，开枪打死打伤返回广州途中的工人多名。与此同时，港英当局还以种种卑鄙手段破坏罢工，如利用船主接受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到上海和南洋招募新的工人，请华商出面调停，分化罢工工人以至试图收买工人代表。但是，这些手法均未奏效。罢工工人在广州附近农民的配合下，使香港海运停顿，粮食断绝，瘫痪如同死港。香港海员大罢工，得到了广州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在经济上的大量援助。我党广东支部专门发表宣言，表示将“竭我全力，为其后援”，号召工人加强团结，“坚持到底”。上海、武汉和北方各地铁路工人，在我党领导下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积极援助香港罢工工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领导上海等地工人，阻止港英当局招募新工人。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大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在三月六日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宣布撤销封闭工会的命令，送还海员工会的会牌，释放被捕工人，抚恤被杀害的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6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李立三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苏联政府派来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原则，反对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所专有。关于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后来，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这样，新三民主义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而且实际上把三民主义和大会确定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当然，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大会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谬论，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期间，列宁不幸逝世，大会以全体代表的名义电唁苏联政府，休会致哀，并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从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实际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

式。这次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它推动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先进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革命斗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黄 埔 军 校

黄埔军校开始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广州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故通称“黄埔军校”。该校1924年1月开始筹备，同年5月正式成立，6月16日开学。这是国民党在我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它的创办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军校建立时，苏联政府提供了开办经费，运来了军械，派来了优秀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官。孙中山兼任军校的总理，并派廖仲恺为党代表。我党陆续派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大批共产党员到军校担任领导职务和政治、军事教官。叶剑英（当时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积极协助廖仲恺进行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党委选派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报考军校，他们绝大多数成了军校的骨干。

黄埔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除了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的讲授与训练外，还进行实战演习，而且在学习期间就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战斗。

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又设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周恩来经常在军校讲课、作报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教育，以及关于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引导学生支持工农运动，积极参加现实政治斗争，为军校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

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军校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武装革命组织。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1924年开学时为五百余人；到1927年3月，已发展到二万余人。军校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并为我党后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蒋介石以两面派手法，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他利用职权，竭力排斥共产党人，网罗一批旧军官，控制了军校中的各级军事领导权。这些人成为他后来疯狂反共反人民的重要资本。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军校一部分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了蒋介石专门培植嫡系部队骨干分子的机构。1930年9月，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停办。

西 山 会 议 派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建立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动小团体，公开进行反对革命的分裂破坏活动。他们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反对广东国民政府。五卅运动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他们以非法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员”，

“解除顾问鲍罗廷”等反革命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买办势力相勾结，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罪恶活动，形成一个公开的反革命小集团，即所谓“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西山会议派的其他分子有的给予除名，有的给予警告处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西山会议派遂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他表面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表示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实际上他是玩弄阴谋，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他打着奉行孙文主义的旗号，大肆散布“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思潮。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他就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三大政策。随后，他又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一次会议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6、7月间，他连续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反动小册子，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反动谬论，形成了“戴季陶主义”。他打着孙文主义忠实继承人的旗号，全面否定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思想上，他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在政治上，他诬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而要把民生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在组织上，他提出所谓团体具有“排拒性”和“独占性”，国共两党没有“共信”，所以不能团结，认为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企图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右翼的反革命工具。因此，戴季陶主义就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理论基础，它从思想上把新老右派联合起来，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第一次东征

国民党“一大”后，广东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但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并不大，局面也不稳固。广州市四周被军阀势力占据，广州市内反动势力也很猖獗。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是盘踞在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援助下，陈炯明积极准备进攻广州。在这一紧急时刻，我党中央发出了《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宣言书，号召广东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起来保卫革命，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打倒陈炯明。1925年2月，在我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参加东征军的部队有粤、湘、滇、桂诸军，和黄埔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有周恩来参加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是这次东征的主力。东征军分左、中、右三路：右路军由黄埔学生军和部分粤军组成，从南面沿海东进，经广九路及海丰陆丰进攻潮汕；左路军由滇军组成，从北面东进，经河源、老隆，进攻五华、兴宁；中路由桂军组成，直攻陈炯明老巢惠州。黄埔学生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得到东江农民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援，因而连战皆捷。2月14日攻下淡水，27日攻占海丰，3月初攻下潮州、汕头，17日攻克五华，19日进

占兴宁，给陈炯明的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战争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到3月底，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势力。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这时，驻在广州的表面上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军阀刘震寰和桂系军阀杨希闵，勾结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奉令回师广州，一举歼灭了刘、杨的反动军队。

第二次东征

1925年9月，陈炯明残部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香港殖民政府给了三百万发子弹和大批现款；段祺瑞政府给了三十万元军饷和两只军舰，又死灰复燃，分兵多路向广东革命根据地进犯。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总指挥部，蒋介石担任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全军编成三个纵队，约三万余人。10月6日，各纵队分途出发，直奔惠州城。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出发前，总政治部制定了战时政治工作章程，成立了二百三十七人的宣传总队，下分三个支队，发表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印刷了《告农民》、《告市民》、《告敌军官兵》等传单。总政治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加强了各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队深入连队，随军出征，这对于夺取东征胜利具有重大作用。纪律严明的东征军深得群众拥护，在东江工农群众的协助下势如破竹。10月14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克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10月22日攻占海丰，26日占领陆丰，11月3日进占梅县，5日收复潮汕。至此，陈炯明在东江的主力全部被歼，第二次东征取得彻底胜利。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又进行了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从而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为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准备了可靠的后方。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香港工人举行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开始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大罢工。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工人也举行罢工。6月23日，由香港回到广州的工人，同广州市的工人、郊区农民、青年军人、学生等共十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军队的枪击和炮轰，当场死亡五十余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无数，称为“沙基惨案。”这一大血案，更激起了广州、香港人民的反帝怒火，香港罢工工人很快达到二十五万以上，并有十三万人陆续回到广州。为了加强对省港罢工的领导，7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各工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罢工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任副委员长。在罢工委员会之下，设有干事局、法制局、会审局、审计局、财政委员会等机构。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罢工委员会出版机关报《工人之路》。7月底，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工人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热情歌颂罢工工人“出全力以反抗帝国主义”，明确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广州革命政府为支援罢工工人，宣布对香港实行封锁，由罢工委员会分派工人纠察队到各海口驻防，严密封锁，使香港变成了“死港”。大罢工和封锁香港的结果，使香港1925年的输出输入比1924年减少一半，商店倒闭，

股票跌价，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整个财政经济陷于混乱。大罢工还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时，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等随军出发，支援革命武装。罢工委员会实行“凡不是英国货及英国船、不经过香港者可直来广州”的政策，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千余只商船入口。这样，不仅繁荣了广东经济，使广东革命政府税收大为增加，而且争取了广东商人对罢工的支持，这也是省港罢工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的重要条件之一。大罢工一直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罢工之一。这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十余万工人和市民连日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战争胜利的大会。3日，英帝国主义者竟派武装水兵进行挑衅，驱逐正在听我宣传队讲演的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打伤群众三十余人，造成“一·三”惨案。为了回击英帝国主义者野蛮暴行，武汉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限令英国政府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肇祸凶手，由政府依法惩办，解除英租界巡捕的武装，撤退停泊在武汉的英国军舰，赔偿被害同胞的损失，并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否则，即行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国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但是，英帝国主义拒绝接受武汉人民提出的条件。5日，武汉人民在我党领导下，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冲入英租界，驱逐英国巡捕，夺回了汉口英租界。当日武汉政府便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英租界。

汉口英租界被中国政府接管，英帝国主义气急败坏，伺机报复。1927年1月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枪杀中国工人，停泊在江面的英国军舰竟开炮恫吓。愤怒的九江人民，当日即占领英租界，次日，武汉国民政府派人到九江，接管了英租界。

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被迫于1927年2月29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正式承认把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约二千余人参加；第二次起义发动于1927年2月22日，先有四十万工人总罢工，接着举行起义。这两次起义都由于准备不足和国民党右派的破坏而没有成功。连续两次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阶级气馁，他们仍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准备夺取新的胜利。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江（苏）浙（江）区委（包括上海）军事委员会书记，于起义前来到上海。为了胜利地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和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起义的具体领导工作。中央特委认真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第三次起义作了周密的准备。在工人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计划；对纠察队进行秘密武装操练和射击训练。同时还做

好了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召开了党团员和各区干部会议，组织工人对敌人军、警的部署调动进行侦察等。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进至上海近郊龙华。3月21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上海总工会先组织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进攻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直鲁联军。这时已经抵达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阴谋利用北洋军阀削弱工人力量。英勇的上海工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于22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上海，并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支持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这是世界工人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史称“四·一二”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极力拉拢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阴谋从内部来破坏中国革命。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也需要帝国主义做靠山。1927年3月，蒋介石在相继镇压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革命运动之后，于26日来到上海，立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起来，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4月12日清晨，蒋介石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反击。蒋介石便借口“工人内讧”，派出大批反动军队收缴“双方枪械”，解除了上海二千七百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伤亡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占领。对于蒋介石的背叛，上海人民极为愤慨，当日举行万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流氓和凶手。赤手空拳的工人，英勇地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4月13日，上海工人又举行了大罢工，并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了十余万人的群众大会，控诉反动分子收缴工人武器和屠杀工人的罪行。会后，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宝山路上血流成河，当场牺牲百余人，伤者无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4月12日至15日，上海工人和革命者被杀害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许多为工人群众所爱戴的领袖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4月15日，李济深等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之后，蒋介石的党徒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和汕头等地，先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同当时武汉革命政府相对立。第一次大革命转向失败。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是1927年6月汪精卫同冯玉祥、蒋介石同冯玉祥举行的两次反共会议。

1927年6月1日，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奉军后在郑州会师。与北伐军事胜利的同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却日益严重起来。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以及其他军阀的包围、进攻下，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加紧。同时，由于陈独秀继续执行其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陷于更加严重的危机。武汉政府为了取得冯玉祥的支持，以对付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同时也为把它在河南前线的军队撤回武汉，以镇压工农运动，扼制共产党。因此，6月5日，武汉政府举行会议，决定邀请冯玉祥到郑州开会。这次会议6月10日开始，12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冯玉祥、鹿钟麟、唐生智等。会上汪精卫集团为拉拢冯玉祥，决定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交给冯玉祥掌握，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双方议定，在河南的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以镇压湖南、湖北的工农运动。

蒋介石早已开始拉拢冯玉祥，双方互派有联络代表。郑州会议刚一结束，蒋介石便致电冯玉祥，要求会晤。6月19日，冯玉祥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于20、21日召开徐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张静江、胡汉民、李宗仁、冯玉祥、吴稚晖等。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并决定由冯玉祥先给武汉政府发一电报，促武汉政府设法使鲍罗廷归国，武汉政府部分委员出洋，其余到南京政府供职，实现“宁汉合作。”

这两次会议使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右倾，参加了反共，使汪精卫集团加速了反革命步伐，促进了“宁汉合作”的实现，加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南昌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7月27日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于28日成立了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团的参谋长。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下，共三万余人举行了起义。参加起义的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起义部队经五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前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仍以国民党左派旗帜号召革命的精神，立即发表了由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的一系列叛变行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8月1日上午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李立三、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邓演达、何香凝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8月2日，聂荣臻领导起义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开抵南昌，与主力会师。接着，在周恩来主持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五；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为朱德。起义部队没有向山地、农村退却，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而决定挥师南下广东，打通海口，争取外援，重新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经临川、广昌、瑞金、汀州（今长汀）等地，沿途多次作战；9月底到达潮州、汕头，又遭优势敌军的围攻，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小部分部队，退到海陆丰，与东江农民军汇合；另一部分由

朱德、陈毅率领，转入湘南，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又壮大了力量。1928年4月，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因此，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以后的革命方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主席李维汉宣布开会后，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今后我党要建立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独立领导工农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发了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和酝酿，最后选出临时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三天。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主要问题是：一、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了它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号召全党在革命处于危机的时候，要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战胜一切困难，坚决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会议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议确定了党要在革命比较有基础的主要省份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政策；三、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政治局委员有九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向；在组织上防止了党的分裂。当然，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容许和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但这并不影响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极其重大的意义。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指“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湘、鄂、赣、粤等省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长沙，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改组湖南省委，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前委将原武

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煤矿的工人，浏阳、平江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收编的原夏斗寅部的一个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由卢德铭任总指挥。根据党中央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关于湖南秋收起义武装要“会攻长沙”的决定，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分三路进攻敌人，然后配合长沙城郊人民的起义，夺取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加上个别指挥员未执行前委指示和指挥失当，以及新收编的第四团临阵叛变，使部队遭到严重损失。毛泽东当机立断，以前委名义命令部队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把保留下来的不及千人的队伍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并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成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前委在古城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10月间，部队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从此创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它在中国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是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

广 州 起 义

广州起义是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利用汪精卫、张发奎和李济深、黄绍竑武力争夺广东的统治权力，广州城内兵力空虚的时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四军教导团，周文雍为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和第四军警卫团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总指挥的行动委员会，由叶挺为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的军事指挥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市区守敌大部被歼。当天下午召开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即有名的“广州公社”。在起义取得胜利的当夜，叶挺估计到广州坚守不易，主张把革命队伍撤出广州到农村去坚持斗争，但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竟指责叶挺动摇，力主坚守广州，结果延误了时机。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不仅动用军舰帮助军阀运兵渡河，而且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直接向起义军开枪开炮。市内的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展开了疯狂进攻，广州郊区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在这一紧急关头，起义军总指挥部曾作出迅速扩建军队，把战线推到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一致抗击敌人的正确决定。可是，时间已不允许，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上来，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12日下午，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不幸牺牲。在强敌的包围下，13日下午，起义军总指挥部被敌军攻陷，广州起义终于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余部撤离广州。一部分到达海陆丰，与东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另一部分绕出韶关，后来到达湘南，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会合。广州起义是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又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衔接，成为中国共

产党创建红军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再次证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新军阀统治下，革命势力企图首先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坚持革命斗争，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

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一年多革命实践的基础上，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并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共九条十四款。它的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主要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对山林之分配，土地税之征收等均有所规定。这个土地法也象一切新生事物一样，难免有缺点错误。毛泽东后来曾指出，这个土地法有三条原则错误：

“（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错误，后来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它对指导农民土地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兴国《土地法》

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到赣南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1929年4月，在江西兴国县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共八条十一款。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决定，纠正了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变。其余内容，与井冈山《土地法》相同。

陂头会议

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1930年2月，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西途中，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联席会议。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会议分析了全国和江西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高潮很快可以到来，在南方各省中，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为此，会议着重讨论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关于武装斗争问题，会议确定首先要解决吉安周围之敌，然后攻打吉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会议批评了以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汉波为代表的迟迟不分田，不废除债务，不武装地方工农的右倾错误，批评了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的错误主张。会议强调对土地的分配要“快”，凡暴动驱逐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为了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土地的分配，应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为了更好地指导革命斗争，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四、五、六军各成立军委，受前委统一指挥。新前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同时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这次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使赣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得以顺利发展，对于推动闽西的革命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

蒋冯阎中原大战

这是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在中原地区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混战，故又称之为“中原大战。”1928年冬东北“易帜”实现，国民党反革命政权暂时获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之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方合作，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同反蒋。双方积极部署军事。五月中，蒋介石下了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双方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反蒋派在军事上进行反蒋斗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形成了反蒋大联合。8月，阎冯李联合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委员，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同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通电拥蒋，派兵入关，占领平津。阎锡山、汪精卫及扩大会议都退到太原。整个战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10月，冯玉祥全军覆没，地盘全丢。阎锡山只保有原来的山西地盘，本人则躲到大连。参加扩大会议的分子纷纷逃离太原，扩大会议烟消云散。攻入湖南的桂军也退回广西。一场大规模的倒蒋斗争完全失败。这一场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壮丁死亡三十万，伤者不计其数。中原大战后，蒋在各派军阀中居于显然的优势。由于军阀混战，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反革命武装力量相对空虚，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在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从各方面进行逼迫的情势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召开的。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然而，王明等人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为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抛出《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集中火力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等人反三中全会的罪恶活动，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支持。他直接策划了让王明上台的四中全会。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他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使用突然袭击的手法，通知代表到会。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多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代表来到会场还不知开什么会。甚至有的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竟不让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外，还有全国总工会、海员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党团和团中央等方面的代表共三十七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在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纲领下，实际接受了王明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二是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实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夺权企图。会议根据